

克萊德起義

威廉·加拉赫著

511

克萊德起義

威廉·加拉赫著

金星、張維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2088/16.

William Gallacher
REVOLT ON THE CLYDE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1949

根據英國勞倫斯-威沙特書店一九四九年英文本譯出

克萊德起義

(英)威廉·加拉赫著

金星、張維羣

世界知識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452·850×1168 1/32·7印張·152,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 (6)0.75元

目 錄

序	1
第一章 早年	5
第二章 約翰·麥克里恩和另外一些人	17
第三章 二月的罷工	27
第四章 “我們不付增加的租金”	40
第五章 “主戰論者”一試身手	52
第六章 戰時的克萊德	59
第七章 徵兵和監獄	86
第八章 工人与士兵的會議	110
第九章 約翰·麥克里恩逝世前	146
第十章 喬治廣場之戰	159
第十一章 我會見了列寧	181
第十二章 大罷工以後	197
附錄甲	210
附錄乙	217

序

我最心愛的財產之一便是一冊十二年以前出版、有作者親筆題字的威廉·加拉赫的動人故事“克萊德起義”。現在，勞倫斯—韋沙特書店出版這書的新版本，我很樂於答應他們請我寫這篇序言的要求。

這次重版對生活在我們的運動時期的這一輩人將有極大的幫助，他們不但能因而曉得種種英勇過人的事蹟，也能知道如何去避免在這些令人振奮的年月裏阻礙了鬥爭的種種錯誤。我主要希望他們能懂得，缺乏一個工人階級真正的、革命的政黨，在當年給運動帶來多大的損失。

在本書的篇幅中，不但有着克萊德地區的偉大人物如麥克里恩、麥克曼納斯、湯姆·柏爾及加拉赫本人，他們由年青的鼓動家而成為老練的政治領袖的演變過程是顯得極為鮮明突出的；還有一些頗為虛偽卑鄙而後來成了議會中裝模作樣的人，這些人甚至成了工黨的政客，他們在我們的時代裏已成了華爾街及倫敦城最冷酷無情的壟斷資本家的主要的政治資產了。加拉赫痛斥獨立工黨，因為它扣壓了麥克里恩的文件和記述，這就使這位卓越的革命鬥士的一部傳記不能寫出，列之於政治文獻而為工人們服務。

我們的同志湯姆·柏爾正好在他夭折以前盡其所能地彌補了這一缺憾而寫了一本論述約翰·麥克里恩的小書；這一本書

是每一個竭誠爲人類的事業而努力的工人的書房裏都應該有的。加拉赫除敘述戰時克萊德賽德的起義之外，還一直敘述到礦工們反對他們極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的接連不斷的鬥爭，這些鬥爭產生出許許多多英勇的鬥士，還給我們的運動添了有才能的來自蘇格蘭的領袖如艾貝·莫法特、阿勒克斯·莫法特、約翰·麥克阿瑟以及威廉·艾倫等，更不消說英格蘭和威爾士煤區的霍爾納、哈蒙德以及許多別的現在仍在領導徹底打垮剝削者的鬥爭的人了。整個世界經過一次令人疲憊不堪的戰爭以後，現在又處於帝國主義侵略威脅之下；右翼工黨領袖正愈益歇斯底里地對共產黨人肆意謾罵，並且還勾結那些與勞工運動所要保證實現的一切作對的兇惡敵人，而勞工運動所要實現的却是諸如不論性別年齡一律同工同酬，以及那些一再提出的、工黨政府將結束保守黨把偉大的蘇聯當作化外之國對待的政策種種保證。英國工黨政府拒絕遵守它在雅爾塔及波茨坦這類國際協定上的簽字，在這件事上我們所看到的是怎樣一種政治墮落的表現呀！

當我寫這幾句話的時候，美國佬的超級空中堡壘轟轟然的声音使我想起了“誰出錢就听誰使喚”這句話；這對自豪的英國所稱道不休的光榮、尊嚴和獨立是多大的一種恥辱啊！看來似乎目前右翼工黨領袖，在跟戰爭製造者的瘋狂合作中，不但已經沒有一點階級意識，並且連常識都失去了。這些戰爭製造者是要又一次地使整個世界洒遍血和淚，充塞不可言狀的痛苦。

正如本書所述的時期中一樣，現在經得起考驗的还是蘇聯，它的英勇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對於人類文明有永遠不能令人遺忘的功績。我們一定得重振一九一七年英國工人熱烈維護十月革命這件事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我們一定得喚醒羣衆，使他們

不但懂得工党政府現行政策中所包藏的危險，還要使他們懂得这一事实：他們能够擊敗这种政策。

克萊德河畔起義的閘門曾一度打開。現在一切都顯示出潮水又在上漲，而且这一次將更為猛烈。

哈里·波立特

一九四八年十月

第一章 早 年

我寫本書的目的是想談談我在工人階級鬥爭中的一些經驗。我不想詳談我的家庭和幼年時代的情況。如果我談到這些事情的話，那也只不过是提到对我之所以成爲一個工人階級的鼓動家有一定關係的早年的一兩件事情而已。

我在七個孩子中排行第四，一八八一年聖誕節生於有名的紡織城市培斯利。我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個蘇格蘭高地人。我七歲時父親就死了。

父親在世時，我母親已不得不辛苦工作；父親死後，她就得更辛苦地工作了。她出外去幹洗滌工作，不得不爲她所賺的每一分錢做牛馬。當我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我常常會在她完工出來時去迎接她，和她一起回家。我常覺得我母親不得不那麼無休止地操勞，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下定決心，一等到我能替她工作，她就應該不再出去幹洗滌工作了。

十歲時，我開始幹活了——每天早上從六點到大約八點半的時候搬搬牛奶桶。這樣我每星期就得到一先令多一點的錢。當我第一次能貼補母親一些我的生活費時，這是多快活的事啊！

到十二歲時，我就永遠離開了學校，得到了第一個全天幹活的職業：當一家雜貨店的伙計。我是一個好好幹活的工人，我的新老闆就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我天天扛重活，可是我却幹得很高興。我全恃自己能幹吃力的工作，才免於很早就被解雇，因

爲我怎麼也受不了对我的“上級”講話時要有老闆認爲我所应有的禮貌。

但是某星期二——我能休息半天的日子——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於來到了。每逢那一天，我回家時常常要帶一大籃食物到我老闆的嫂子家裏去。既然她的家就在我回家的路上，我也就從來不拒絕這件工作。她的兒子——我老闆的侄兒，也是店裏的伙計。

但是那一天星期二，正好我們已幹好活，一捆燻火腿送到了店裏。老闆說，“等一下子，”他便打開捆，拿出一隻來，接着他就將這一隻剔去骨头用繩子紮好。

我愈來愈不耐煩地等着要走，我不是等了一下子而是等了很久。老闆搞好時已差不多兩點半了。然後他拿着火腿走到我的跟前，將它放在我身邊的籃裏，要我送給一個定購火腿的顧客。

這等於要我在回家的路上拐一個大彎，所以我就抬頭望望老闆說：“你知道每星期二我是兩點鐘息工的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人像他當時那麼樣吃驚的。他喘着氣說：“你是甚麼意思？”我告訴他我的意思是我願意照往常那樣送食品而不願意送這隻火腿。

他瞧瞧我，好像我是很奇怪的小傢伙一樣，隨即便破口大罵。可是我很倔強。他覺得對我沒有辦法，於是想要新的手腕。他對他的侄兒嚷道：“去叫一個別的伙計來。”

我很年輕，但是並不年輕得連這種樣子的威嚇都看不穿。誰也不能找到願意“送貨”的伙計會在街頭到處攪着的。可是他的侄兒却應命走了出去。

老闆用威嚇的口氣問我：“你到底送不送？”我將我原先講

过的話重複了一遍。他大声說：“算了，滾出去。”我就出去了。

那位侄兒在外面等着我。他求我回去拿那件貨色。他哼着說：“你不送，我就得送去。”這並沒有使我十分焦急。我再一次說：“我可以送往常的一份，別的可不幹。”接着我就回家了。

我告訴母親出了甚麼事的時候，她只搖搖頭。她不很懂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她總相信“我們威利（即指加拉赫——譯者）是錯不到那兒去的”。我和老闆發生大糾紛，這是第一遭。

第二天早上我回店去。老闆大声說：“你來幹嗎？”。我回答說：“我來要我的錢的。同時，如果你願意的話，在你找到別的伙計之前，我願意幹下去。”信不信由你：那種工作我以後一直幹了好幾個月，正好像沒有出過甚麼事一樣。然而到了我規定應該歇工的時候，却再也沒有人要我留下了。

我一到十四歲的時候，就離開那家雜貨店而在一家衛生器材製造廠裏找到了一個職業。進廠不久之後，我信了禁酒運動，因為我深惡痛絕狂飲濫喝。這種深惡痛絕的情緒是由於我的家庭、特別是由於我的母親而產生的，因為她因我父親太喜歡喝酒而痛苦得很。他是一個好丈夫，一個非常和祥的父親，到了生前最後幾年竟完全克制了他喜歡濫喝的慾念。

這裏我該提一下，我父親是從軍隊裏開小差因而背上受過烙印的最後一批人中的一個。他是在我母親病重時開小差來看她的。因而烙印就一直在他身上，以後在兩肩之間就帶有一個燙入皮膚的D字。

不論是誰看到了而問起這個D字有甚麼意義時，我父親就會聳聳肩回答：“代表體面。”^①父親死時，我還很小，不過我大哥已經是個青年了。他是我母親最心愛的孩子。她對我們都很

好，可是她多麼喜欢這個最大的孩子啊！当他喜欢喝酒逐漸成癖的時候，這幾乎使她發了瘋。她的痛苦是很深的，所以我每次走过酒店時就憤憤然地握緊我的小手拳。

在我新的職業中，我很想好好幹，使我母親尽可能快一點離開洗滌桶。我十九歲以前還沒有這個可能，只到了那個時候我和我姊妹一起掙來的錢才使我母親放棄了斷腰折背的苦活。但是長期的艰苦勞動對她是太過份了。短短的幾個月以後，還只五十四歲的時候，她的身体垮了，而且生了幾星期的病以後，就死了。

真是一幕不折不扣的工人階級生活的悲劇。這是我看到的在工人家庭裏再三重演的一幕悲劇。然而這也是一幕我永不能忘懷的悲劇。她至死都很喜欢她的大兒子；她至死都堅持——儘管在她的暮年時我已看起“怪”（社會主義的）書來了——“我們威利是錯不到那兒去的”。

雖然我是一個極好研究社會主義的人，不管我在那一個工廠做工，總是經常辯論，可是直到一九〇六年我二十四歲時，我還不肯支持羅伯特·斯米利在培斯利當議員候選人，因為他是一個酒業托辣斯的董事。那位後來成了我妻子的年青的姑娘，是竭誠支持斯米利的人，她幾乎因他的失敗而心碎腸斷。如果她當時能抓到我的話，她真會打得我頭破血流的。

選舉完了以後，我憤然得知就是和我談起斯米利與酒業托辣斯的關係而使我不選舉他的那些禁酒運動的同志們，選舉期間却在倫弗魯東奔西走支持湯麥士·格蘭·柯茲當候選人，而他們是完全知道他與一家酒業托辣斯是有關係的。這就使我退

⊖ 烙印為D字，原意是代表“逃兵”的。在英文“逃兵”與“體面”起首字母相同，所以他父親故意說成“體面”。原文“體面”一字是按土音拼的。——譯者

出了有組織的禁酒運動。我割斷了和它的联系，四下尋找新的同路人。

我加入了独立工党培斯利支部，它在同一天晚上还吸收了另一個新黨員。他叫派脫·瑪克萊。我們成了最親密的朋友而且很快就發覺我們对新環境都有同樣的反感。環境太有禮拜天聖經學校的味兒了。環境太像我們兩人正想擺脫的东西了。

我們四出搜索要找一些更適合我們脾胃的东西，因而發現了在一家皮匠舖裏聚會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小組。我們參加了他們這一伙，而且很快地成立了社会民主联盟的一個支部積極活動起來。瑪克萊和我每星期天晚上都要作演講。那時候我是一個說話遲鈍、亂放大砲的人，把我所知的一古腦兒放進了社会主义的宣傳中去。可是瑪克萊却很有天才。他的演說，即使在那些早期的日子裏，也是才智兼備的。

他經常在当地報紙——培斯利的“每日快報”——上進行一連串的辯論，他的信具有這樣的性質，只要在廣告上一提“派·瑪克萊來信”，就足以保證那一期賣個精光。在這些天賦以外，他还擅於運用鉛筆，如果能給他機會的話，他很可以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漫畫家。

天哪！他為需要所迫，到黃金海岸工作去了。十個月後，他回到蘇格蘭來，身體已經垮了。回來後兩個月他就死了。他斷氣時，我整夜陪着他。我們曾是很親密的同志，看着他死去真是痛苦。他是多麼聰明，多麼的富於思想，多麼能為他所從事的事業幹出了不起的事；但是他就在求生存的鬥爭中喪失了生命。

通过社会民主联盟，我接觸了約翰·麥克里恩，他的高尚的革命的熱情對我有很大的、永遠不可磨滅的魅力，在決定我一生所走的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〇九年在蘇格蘭是失業的人非常多的一年。我在工作中和工頭發生了爭吵，爭吵結果我遭到了開除。我便開始尋求另一個職業，可是我甚麼職業也找不到。國家正碰到了失業危機，結果，約在一年後就施行了“勞工保險法案”。

正當我走頭無路的時候，我偶然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他是在定期往來大西洋的航船上當服務員的。和他談了一次以後，我就去碼頭，想去找一隻船。通常船進碼頭時，當服務員的“便忙得不可開交”，裝糧食啦、被物啦，以及別的和他們職務有關的東西等等。做這種工作是常常要僱臨時工的。在得以和亞蘭公司的航船“勞倫新”號簽定合同當服務員之前，我找到了這種臨時性的工作。

這種工作是很苦的——洗滌、掃除、端飯食。不久我就和同事們發生糾紛，因為我拒絕了小費。他們得靠小費來補工資的不足，因而他們總在找小費。可是我自己怎麼也不慣於收小費。一想到要伸出手去，我就討厭，而且我所接觸到的大多數旅客是很窮的，他們顯然還要拿他們所有的每一分錢去另謀新的生活。不過，這只是隨便提到一下罷了。

船到了波士頓。旅客走了，貨物卸了，我們準備回航了。我們是某一個星期五離開波士頓的。星期日下午我們碰上了濃霧。整個晚上我們在霧中航，只模模糊糊地曉得我們已到了甚麼地方。星期一早上五點半鐘，船突然停住了。我們已經撞上了紐芬蘭河岸外的一個暗礁。僥倖得很，我們船上沒有好多旅客，好容易將他們裝上了救生船；又費了很大勁我們才找到了可以上岸的地方。

我們上岸的小灣是一個夏天用來捕魚的場所；那兒有一簇小屋，我們正好在那裏暫時歇一歇，一直到星期二下午，紐芬蘭

來的一隻船把我們裝走，帶到聖約翰去。在等着船來把我們載走的時候，我所說，按照章程從船觸礁的時候起，不管我們甚麼時候回去，公司就可以不給工資。可是，當時誰都相信亞蘭航船公司會付給整個航期的工資的。

星期二下午當“普羅斯佩羅”號停在小灣外面等着把我們載走的時候，我們將旅客和他們的行李裝上船，把他們划出去。一上船，我們就吃到了茶、麵包、人造奶油和罐頭牛肉。我們以創紀錄的速度收拾了桌子。我們不得不在聖約翰呆上一星期，然後亞蘭公司的航船“蒙戈林”號才將我們載走，帶我們回格拉斯哥。

到了格拉斯哥，就在離船之前，我們接到了工資單。多氣人的事！只十八天工資！我們的工資從船觸礁的那一刻起就停止了！我（其中的一個）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十八天每天兩先令。只三十六個先令，還得付我出發前領到的服裝費十七先令十一便士，而這些服裝却是工作所必需的。

我找來了幾個同事，提議我們來鬥爭一場。我指出我們一直在待命，而且星期二還執行了命令，當時我們還把旅客和行李送到“普羅斯佩羅”號去。但是他們不敢大胆進行鬥爭。

第二天我們得回“蒙戈林”號去簽字領款。我們排隊，走進大廳去，出納主任和別的幾個職員跟職工事務局的代表一起坐在那兒。我們一個個地領取他們給我們的錢，而且还照例簽了字。

輪到我的時候，我放下工資單，指着扣除的款額說：“這一項你是甚麼意思？”他們都望望我，接着出納就大聲說：“你是甚麼意思？”我回答說：“我的意思是，公司應該給我這三十六個先令，而我要的就是這三十六個先令。”

出納用委婉而似乎有道理的話試一下。他說：“可是你得付你所領到的東西的錢呀。”

我說：“對，不過那是我的事，你用不着管我。目前公司欠我三十六先令，在我未領到這三十六先令以前，我不簽字。”

這似乎把他堵住了。出納廳職工事務局的人，想在他很窘的時候幫他一手，可是甚麼也得不到。當職工事務局的人坐着默不作聲時，我想最好也惹他一下子。我就說：“你在這裏目的是要使我們確能得到公道的對待，所以就請你給我弄到這三十六個先令吧。”

這時候，出納才有點兒鎮定下來，他說：“可是，對這件事我們在這裏是毫無辦法的。你最好星期一去辦事處吧。”我走出了大廳，沒有簽字。在甲板上伙計們將我圍住了。他們大都這樣批評我，“你這樣做是得不到甚麼東西的。”我回答說：“好罷，得不到，我就不簽字。”

星期一我大清早就去鮑斯威爾街的辦事處。我請求接見，經理就出來了。他完全听信職員的話，一開始就告訴我他對我看法怎麼樣——自然沒甚麼了不起。我就以牙還牙，所以他便派警察來趕我走。來了兩個警察，把我勸了出去，我就回碼頭來，還不得不忍受在那兒逗留等待另一隻船的伙計們的許多嘲笑。但是到兩點鐘的時候，辦事處來了個職員，要找加拉赫。他告訴我說碼頭看守長要我去。

因而我就去見碼頭看守長。他說：“我听說你在鮑斯威爾街那邊大鬧了一場。”我告訴他，我只不過回敬了一下而已。他說：“但是你發脾氣是錯的。現在你如果再去那兒的話，我相信事情就會很順利了。”

我懂得那是甚麼意思，所以我又去鮑斯威爾街跑了一趟。職員們一看到我，便馬上交頭接耳，顯然希望我的光臨會給他們沉悶的生活又帶來些微的刺激。但是他們是注定要失望的。出

來的不是經理而是出納，他要我和他去職工事務局，向我保證，現在一切事情都已辦好了。

在職工事務局的辦事處，我拿到了那三十六個先令，扣款已在我的工資單上劃掉了，我就簽字，同時還簽定我跟亞蘭航船公司斷絕僱傭關係。

當我在碼頭边上把我的三十六個先令和工資單給伙計們看時，他們幾乎有些呆了。他們唯一尚能自慰的，便是相信我在格拉斯哥港再也找不到別的工作了。

但是第二天我大清早就去各個碼頭，因為我已聽說“加利福尼亞”號（安哥航船公司的一隻船）從紐約回來了。一大羣失業的海員也已經到那裏了，希望能得到僱用。和我在“勞倫新”號上一起當過服務員的人大多數都在裏面。我打聽到服務員領班的名字——一位魏脫先生，並且裝着似乎要離開碼頭的樣子。幾分鐘以後我很快地跑回“加利福尼亞”號來。我拚命地衝上鋪在舷門口的跳板。我氣喘喘地向跳板頂端把守着的海員說：“我要告訴魏脫先生一個極重要的消息，我在甚麼地方能找到他？”他指點了我，我就敲了服務員領班頭的房門。

一進去，我就看見一個神色愉快的人坐在一間很舒適的房艙裏。我進去時，他站了起來，並請我坐一下。我開口說：“魏脫先生，你聽說了嗎，‘勞倫新’號幾星期以前沉掉了？”這對他是一件新聞，他馬上就感到很有興趣。我把失事的情況說給他聽，還表示希望他能原諒我闖進來找他。接着我就先解釋我過去最初受僱的困難情形，還說到我經過第一次航行之後又怎麼被停歇了。他問了我幾個親切的問題，然後便叫我第二天來“工作”，答應他会照顧我星期四讓我跟原有的人手簽訂僱傭合同的。

因此，在星期六那天，使我的“勞倫新”號上的舊同事們極為